

理 由

香港心态录

1997

理 由

香港心态录

作家出版社

香港心态录

作者：理 由

责任编辑：王彦祺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刘国庆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03 千

版次：1987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16—8/I·15

统一书号：10248·0203

印数：0,001—11,000 册

定价：1.50 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VEO 5/21

九七年.....	1
香港心态录.....	23
澳门蒙太奇.....	94
汉城信步	136
东方的“飞去来器”	179
倾斜的足球场	194
后 记	225

九 七 年

这次去香港之前，一个富于幽默感的朋友对我讲了一则预言式的笑话。他说，一个人初次去某地旅行，落笔洋洋洒洒，他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书；第二次又去，硬着头皮再写，他只能写出薄薄的几张纸。如果再去第三次的话，才知深浅莫测，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前两次去香港，我写过一本书也写过几张纸，写香港的高楼如林，海湾如梦，赌马如狂，人情如水……虽然只是向一个陌生的花花世界匆匆地瞥了几眼，自己也不知从哪儿找出那么多的话来罗嗦。

当视网膜上新鲜而直观的印象渐渐化为平淡以后，剩下的唯有朦胧的理念，而理念对于一个散淡文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荷。第三次去香港，我就面临着朋友所说的困惑。

“你是否觉得有明确迹象显示北京将收回香港？”

现在如果有谁向香港人提出这个问题，不但幼

稚，而且荒诞。中国将于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主权，北京和伦敦都表示了同样明确的态度。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香港人的心理却一反常态，把远虑看成近忧，仿佛在掰着手指头过日子。有些人计算剩下的时间那副焦灼不安的样子，犹如凝视着宇航中心的电子屏幕，数码是倒着读的。可是，仅在几年前，许多香港人并没预见到那一天必定会来，而来得又如此迅疾。一九八一年底，在我初次访问香港时，曾经看到中文大学学生会社会部所做的一次盖洛普式的调查，其中认为北京于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可能性“相当大”的人只有5.8%，认为这种可能“稍大”的人约6.9%，而认为可能性“稍微”、“相当微”和“现时无法估计”的人却高达84.8%。

一种普遍的忽略掩盖着一种沉重的隐忧，人们不去对“九七”做出明确的判断恰恰出于对这件事的惧怕。在同一份调查中，提问者假设北京将宣布于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进而搜集反应，表示欢迎的3.5%，不反对的17.7%，无可奈何者41.9%，反对的16.1%，其它则抱“无所谓”的态度。当问到个人将有什么打算时，答案是分散的，其中以“设法离开香港”的人最多，占25%。当时，想象力奔逸的文人已经在社会幻想小说中勾勒着香港的未来，在报刊上登载着一则讽刺小

品，文中用尖刻的笔调把一九九七年的香港描绘得一片恐怖：银行倒闭，工厂破产，商业区的霓虹灯转瞬间熄灭，失业的人们走上街头去游行。守在电话机旁的新任香港市长是一个油头滑脑的“世界仔”，他先用“当年英国佬也不准随便示威”加以制止，又借用北京的名义高声恫吓，宣布“不论反社会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人统统都该死！”结果吓得人们做鸟兽散，留下一座老鼠跳梁的空寂的死城……

这类调查在我这个大陆人的眼中看来未免刺激神经，但它反映了徘徊在某些香港人心头的浓重的阴影。指责香港人不爱国吗？有的香港人（例如有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会用诧异而执拗的目光打量着你，反问道：“为什么要我爱国？爱国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政治观念，凭什么一定要我来接受？”更多的香港人会向你讲到“民族认同”——黑眼睛、黄皮肤的同一血缘，长江、黄河和广袤大陆的梦中故乡，中华民族悠久和深厚文化的共同熏陶……他们并不把爱国主义看做是客观外加的责任，而看做是一种主观内省的承担，值得爱的就爱，不值得爱的就不爱。

同是炎黄子孙，香港人的国家与民族观念是多义的、多线性、多层面的，他们和大陆的传统观念有交叉、有共鸣，也有时大相径庭。要怪就去怪历史吧！

上个世纪，当着中华民族处在最涣散的时刻，他们是被衰败清朝政府抛弃到海外港岛上的一小盘散沙，岁月的沧桑又拉开彼此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差异而使香港人更渐疏离。当我乘坐从广州直达九龙的列车通过罗湖桥边境的一刹那，脑子里倏然闪过一个念头——收拢香港的人心远比收复香港的主权要难得多。

这条铁路我曾经往返过许多趟。这里是新界，清朝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在一八九八年签订的《北京条约》“租”出的就是这一大片土地。当初英军进驻新界时，曾遇到以当地邓氏家族为首的华人老百姓的顽强抵抗。米字旗升起的那一天，英国的绅士和淑女们从香港岛赶到新界来庆祝，并且抱着愉快的心情当做一次春天的郊游，没想到却激起新界居民的抗议和骚乱，使升旗仪式大煞风景。那时中华儿女的血气方刚，令人丛生感触。

自从英国政府一文钱不花就把新界租到手以后，压根儿没有好好治理过。稀疏的农舍，空旷的田野，覆盖着野生灌木丛的洼地和裸露的山坡，这就是新界留给我们的印象。直至一九八三年初仍是一片被冷落的土地，好似香港的“北大荒”。我凝神注视着车窗外，心中叠印着前两次和这一次的比较，试图解开一个疑团——英国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在干些什么呢？

曾听人提醒说，当九七年临近时，忙着刮地皮，捞油水，外加搞通货膨胀，象一切老牌殖民主义者那样，在打点铺卷之前将以加倍的贪婪攫得最后的一把，然后就拍拍屁股走掉。英国人既然决定退却，历史上任何一次退却都伴随着席卷的祸水。如果他们不是忙着这样干，那就是在百无聊赖地呆着，甩手、泡汤、混日子，充其量当一个维持会的角色，然后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主权者来接收……

列车在缓缓运行。几幢豆绿色和米黄色的高楼从窗外闪过。它们矗立在寂静的田野上，显得高峻、突兀而孤单，却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在我的记忆和眼前的现实的凹凸对比中显得特别惹眼。仔细看看楼房的窗口，好象还没搬进住户，显然是刚刚竣工的居民楼。楼旁有两所新开办的学校……

一片奇特的建筑群在接近，圆鼓隆冬的造型，密集地簇拥在一起，仿佛蘑菇床上长出的巨大的蘑菇。我来不及看清那是新建的贮油库、净化厂或别的什么设施，疾驰的列车便把它们抛在后面。

列车经过中文大学站。记得两年前这是一个充满乡间野趣的小站，从九龙红磡开往这里的火车简陋得好像十九世纪的老古董。站在高高的车厢踏板上往下一跳，双脚落在高低不平的荒地上，稍不留心就会崴

了脚脖子。时隔不久，它变得难以辨认了。悠长的月台，整洁的走廊，雪白的挑檐，变得清新而明丽。车站上停着一列相向开来的电气火车，想见两年前还在施工的狮子山隧道已经打通了。那奶油色的车身涂着桔黄色的装饰线条，相形之下，我们乘坐的这列从广州开出的陈旧的火车反倒显得有点寒碜……

往前驶去，荒野消失了，楼宇在崛起，曾经是穷郊僻壤的沙田冒出一大片新建的居民区，渐渐和繁华的九龙半岛融为一体。在短促的时光中，港英当局兴建了不少公共设施，新界发展的速率比内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香港对同一现象起码有两种以上的不同解释。你可以解释为港英当局趁九七年之前正在加紧拍卖新界的每一寸土地，你也可以解释为港英当局对保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许诺怀有诚意。从新界的变化看来有一点是确定的，英国政府在部署撤退时考虑到了他们自身的形象。这是一次用心良苦的撤退，艺术高明的撤退，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一次“光荣、体面的撤退”。对此我感到宽慰，犹如观看幕落前的最后一场演出，但愿他们演得更加精彩。

当车窗外出现淡蓝色的海湾时，我的目光在空茫的岸边搜索着，忽然发现缺少了一些什么。我想起来

了，这次不见了沙田画舫的影子。那是一艘描龙绘凤的木制的大船，静静地临岸而泊，又象在飘摇而动。它是摹仿北京颐和园石舫设计的，规模却大得多，楼上楼下开设着餐厅，吸引着香港人前来领略一番慈禧太后当年的雅兴。如今沙田岸边少了这座著名的画舫未免使人惆怅。后来，听香港的朋友告诉我，它被内地的某个单位看中，花钱买回大陆去办旅游业。这项清朝王室的发明专利也象如今内地许多时髦的商品那样，出口转内销了……

我头一次听说香港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香港精神”觉得怪新鲜的。以前常听香港人在自怜自艾，一个劲儿地抱怨香港的世事艰辛、人情淡薄和殖民地二等公民的不公正的待遇，很少听到他们自豪的炫耀。而且，我立刻联想到在内地盛行一时的“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那类高亢的政治口号，当时差点儿没笑出声儿来。想不到在政治上冷感的香港人居然也变得喜欢阔谈浪漫主义的豪言壮语。

那是一天晚上，在紧张繁重的采访日程之余，我坐在油麻地街边的一间低档的小面馆里匆匆打发肚皮。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胖墩墩的中年汉子，穿一件粗布夹克衫和一条紧梆梆的牛仔裤，嘴上留着浓密的

小胡子，颇有点儿混迹江湖的马仔的气概。他是这一带的“杂差”，每天夜里驾驶摩托车在附近相陪。我的一位老友拜托他对我多加关照，他便侠义相陪，耐心地看我吞着一碗飘浮着几滴油星儿的光面。隔窗的斜对面有一间“麻雀馆”，门前的对联是“鸡鸣报到回春日，记得发财在此家”。街巷深处的“一凤楼”，一间挨着一间，向朦胧的夜色中延伸，门楣上高悬着日光灯映照的赫然大字招牌：“天下美女尽在此楼，录相服务，五味一楼，大波鬼妹，有假包换……”色情业的发达是香港名声遐迩的标志，而这位朋友却漠然地看也不看窗外一眼，或许他已司空见惯了。

他说：“那条街叫庙街，再过去是旺角，算得上是最杂乱的地方。你以为香港人都喜欢吃喝嫖赌吗？其实一栋大楼里如果有一个妓女营业，邻居们都很讨厌。从外面来的嫖客有时按错门铃，难免惹一肚子闲气；大人们更担心自己的后生仔跟着学坏。你看，好多招牌都被老百姓们砸烂了。”说到这里，这位相貌粗犷的朋友忽然吐出一串文绉绉的字眼：“我们香港人有一种香港精神。拚命工作，讲究效率，不怕失败，直到把事情搞掂！好多人在香港住了几十年，没去过一次夜总会，没逛过一次一凤楼，没进过一次麻雀馆。你去问问香港人那些地方是什么样子，没有几个答得上

来……”

我顺势看去，街边那些高悬的有机玻璃招牌的确有些被砸得支离破碎。人行道上穿梭一般的人流，一个个行色匆匆，目不旁视，也没看见一个人止步流连。也许他们太累了，累得就连一个多余的表情或多余的动作也不肯轻易浪费，香港的灯红酒绿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无缘。我相信这位朋友说的话，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有深存于人们意识底蕴的良知系统，才能维系着它的文明而不至于毁灭。

香港人的干劲真是举世罕见。他们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当中，在一块狭小的弹丸之地创造了东方的奇迹。如今，它是吞吐量名列全球第三位的国际港口，它的某些轻工业产品位于世界之冠，它的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而居于亚洲的第二位。而且，它正在发展成为在东方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这些骄人的成就是在—块毫无自然资源(甚至就连一粒稻米也不打)的地方上取得的。当你站在太平山顶，透过夜色眺望维多利亚湾两岸丛林般的建筑和迷人的灯火，你会觉得整个香港如同巨大而剔透的水晶在天鹅绒似的帷幕上熠熠放明。一位朋友指着山下的景物向我问道：“你知道香港为什么充满活力吗？”这位学者到过全世界许多地方，专门研究市政建设，他自问自答地讲下去，“拿香

港和其它城市相比，顶数它的‘承包责任制’最落实。落实到每一座厂房、每一间写字楼、每一家商店直到每一个小摊档，把全体香港人卷入一场急骤的经济旋风。中国人的勤劳苦干加上英国人的管理才能和北京长期以来对香港实行的稳定政策，这些就是香港成功的奥妙。”我默默地听着，油然感叹我们对香港的积极报道太少了，而对香港的消极揭露却时时见之于内地的报刊。这类宣传自然能够加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同时却收到谁也不曾预料到的副效果，对于某些六根未净的凡夫激起去香港开洋荤的心理。据说内地有一个偏远省份的贸易代表团抵达香港，向当地主人提出的头一个要求就是包下整个别墅的妓女，供他们倚红偎翠地销魂了七个夜晚。一个老实巴交的香港朋友战战兢兢地叙述着这件事，听来犹如形容几只在漫长的冬日旷野上饿红了眼睛的狼，当它们扑上去的那股劲头比当地的烂仔们更猛烈……另有一位香港的教育界人士抱怨说：“你们许诺在九七年以后香港人舞照跳、马照跑、钱照赌，固然可以使香港人听了放心，但是我觉得委屈，好象我们香港人就喜欢跳舞、跑马、赌钱似的，我感到羞耻。香港人的精神是复杂的，这里所关心的自由包含更多的意义。”

此行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提起“香港精神”。在

市民的街谈巷议中，在企业家的写字台前，在文人们的书房里，令我这个从大陆来的人听了耳熟能详，什么“拼搏”啦，“献身”啦，“分秒必争”啦，“白手起家”啦……越听越象似曾相闻的内地语言，甚至有时也牵强附会地上纲上线。某当红的电影演员拍摄一部武打片，从几层楼的高处跳下来，当场摔得趴在地上不能动弹；他躺在那里喘了喘气（是否说了什么豪言壮语不得而知），立即爬起来再干。一位擅于画龙点睛的女士把他誉为“香港精神的典范”。我觉得新异之处倒不在于对香港精神的提法有所质疑，而在于前后几次采访的对比。几年前和香港的朋友倾解（谈心），有人向你叫苦叫累，有人感慨这里的民风日下，也有愤世嫉俗者对“丑陋的香港人”的劣根性发出诅咒，却很少有谁向你神采飞扬地阔谈“香港精神”的妙语，这种舆论更有腾空升华之势，成为自发流传的众人口碑。

大年初二，当地的一位女作家相邀几位文化界的朋友去假日酒店欣赏节日焰火，那个晚上天空中落英缤纷，海岸傍人山人海。当硝烟飘散之际，这位同行女士送我去地铁站口，她在徐徐拂面的清凉晚风中低头若有所思，忽然抬起头来遥望着夜空中一个茫然的焦点说：“我刚从欧洲旅行归来，有一个发现。我爱香港，真的，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地爱！”

香港人比以前更爱香港了。他们是害怕失去才更爱的。

常说文人相轻，其实港人也相轻。

“你说香港人管理香港？究竟是哪一位或哪几位港人？他，他，还是他？他有本事治理得好么！香港人只懂生意经而不懂政治，把香港交给港人管理将落得一塌糊涂。如今在本地热衷于折腾的人不是投机家、野心家就是小爬虫，他们想过过官瘾呢！”

说这番话的是一位道地的港人，还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雅士。那是在三年前一次喝咖啡的时候，他向来自大陆的朋友慷慨陈词。其时关于香港的前途尚未正式开谈，而香港人管理香港在当地已有风传。一时间，你揭我的短处，我提你的痛脚，那不共戴天的气势比文人相轻更胜过几分。令闻者的情绪也跟着沮丧，好似由香港人来搞政治简直不可救药了。香港人的心理模式不但与大陆两样，也与世界上许多地区迥异。就拿“人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句话来说，一般人都会当做至理名言，不会觉得有什么谬误；而有些香港人则认为是一句伟大的空话，并奉送几句酸溜溜的嘲笑。

在世界反殖民主义的历史上常见为争取自治权

而浴血奋斗的史诗般记录，却鲜闻一个主权国家在收复失地以后把治理权交给当地人还甩手不管的怪事。香港人形成这种特殊的心理不是偶然的。香港历来是有自由而缺少民主的社会。港英当局一向大权独揽，当地人从未得到机会在政治上显示身手，寥若晨星的“社会贤达”至多只有被咨询的份儿。

最近，一百八十度，舆论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我在和香港朋友聊天时，常常听到对方试探性的提问：“你留心了吗？最近你们那边不再提香港人管理香港了，中国官员有好几次讲话都没提，这不会是无意的疏忽，香港人当然很不放心。不要香港人治理香港又怎么办才好呢？”对方的脸上充满了疑虑，仿佛非得当场听到明确的答复才吃下一颗定心丸。类似的担忧也在香港人当中纷纷传议着，又闹得满城风雨，从不要香港人管理香港，变得唯恐不要香港人管理香港了。

更有一位香港著名的怪论家惯说反话，俨然摆出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我早就有言在先，香港人管理香港是地方主义。现在，你在哪个左派或亲左派的讲话中找得到这句话？这个口号根本错误嘛！广东地方主义厉害，三十年前就挨批了。香港是广东人的天下，千万不能重蹈覆辙……以前讲过，那是跟香港人开玩笑。”